从合理性论经济的价值变迁

田 青

(浙江大学 西溪校区金融与经贸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以交往理性为前提的新经济价值观将影响到企业目标的设置和经济政策的定位。本文从经济社会学视角出发 ,从合理性形式入手来阐明经济价值变迁的理论前提 ,并以当前经济发达国家在经济因素中重视社会和公众的趋势为例 , 阐述对新的经济价值观重视的必然性以及经济行动中的公众利益和社会要求越来越受关注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经济的价值;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 F014.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1999) 03 - 0098 - 05

Analysis of Economic Value on the Basis of Rationality Forms

TIAN Qing

(*School of Finance , Economy and Trade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 : New economic value ,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 emphasizes especially the public interests and social requirements. Such economic value approach may influence the goal programming in enterprises and even the economic behavior and decision of a country.

Key words : economic value ;rationality

一、绪 论

社会的发展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 ,使人们的认识世界发生变化 ,也使人们对许多问题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比如对生产决策过程民主化的认识 ,对工业基础设施与环境影响的看法 , 人与工作之间新的关系的认识 ,劳动的价值等等 ,人们越来越期待一种理想的经济体系 ,一种经济行动可接受的社会形式 ,一种新的合意的经济秩序。怎样的经济才能满足“理想的 ”、“可接受的 ”和“合意的 ”条件呢 ? 这就涉及到了经济的价值这一概念。这里所说的价值不是从价格的角度去评判价值的固有值 ,而是把价值看作为一种受到社会制约的愿望 ,期待中的对社会行为和社会状况的设想[1] ,经济的价值表现为经济生活中被大众期待的特定的行为方式、规则和状况 ,这些方式、规则和状况决定着经济与社会的关系 ,决定着经济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 ,决定着劳动岗位上的关系 , 如雇佣与被雇用的关系等等 ,换句话说 ,这种价值是对经济行为的期待的理想标定和设想[2]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伴随社会进步而来的新的经济价值观 ,是因生活世界的不断合理化所致的 ,所以本文就从分析合理性形式的变化 ,尤其是从交往合理性入手 ,来阐述符合这个时代的新经济价值产生的理论前提和必然性 ,以及经济行动中的公众利益和社会要求越来越受关注的必然性。

[收稿日期] 1998 - 10 - 28

[作者简介] 田青(1963 -) ,女 ,江苏人 ,浙江大学金融与经贸学院教师 ,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及企业文化研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合理性形式之分析

合理性(Rationalitaet)这一概念从本质上讲是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并在人类社会进步中不断得以更新的。当初级阶段的合理性随着人与世界的关系由简单到复杂的嬗变而变得不再那么合理时,就有了新一阶段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合理性在层次上的变化,才有了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合理性存在的担忧,进而对合理性理论的不断研究和发展。

(一)工具—目的合理性

工具理性是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 - 1920)首先运用来剖析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起源与本质的,他试图将现代西方社会予以"合乎理性内容"的定位。韦伯精辟地指出,西方文明的演进是出于对目的合理性的追求,这个社会的一切行为与成就是以工具—目的合理性为取向的。在这一层次上,人显示出它的自然属性,即支配技术以达到目标。在经济生活中,工具—目的合理性可演绎为市场—目的—手段的合理性,换言之即有关支出—收益的合理性,它强调经济的核心功能,将市场所有关系现实化。这种概念下的经济集中了一系列诸如利润、增长率的因素变化以及竞争等市场系统条件和经济行为。这种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工具理性曾对工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且具有高度的价值持续性。由于它符合了大众的期望,所以它所产生的功效是积极的。这种大众期望包括技术进步、高生活水平、物质稳定、多元消费等社会物质。

然而,在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利润积累,人成为实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此种工具理性条件下的经济往往在一边倒地追求增长的激发时,忽视了其社会作用的发挥,也忽视了社会的民主化和本身的参与。激进的工具理性推崇者甚至还忽视社会道德的定位,或者视而不见家庭与生态问题以及文化的纽带和联系。当一个国家在未达到生活温饱水平之前,这种状态往往会倍受期望的。当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从温饱进入小康后,甚至像许多发达国家已达到富裕生活水平后,是否仍只满足于这样的状况呢?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价值变迁的问题,那种仅限于增长和物质满足的要求似乎已不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了,由此衡量企业的绩效的尺度到今天也应该有更广泛的含义了。经济也不再能继续一厢情愿地、纯功能性地回避其行动的社会和环境的作用,或回避其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了。以往企业对许多公众问题的漠不关心或者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在今天将不可能再被接受。不同于以往的是,今天的经济与社会之间有了从多方角度被大众期待的新的关系。

韦伯也看到了这一点,他预知目的合理性原则越来越广泛的发展最终会引发非理性的结果:一旦人的行动根植于目的合理性的取向中,一切将都变成盈利的工具。在韦伯眼中,西方的经济组织正是体现了目的合理性的理性原则,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却压制人的本身的信仰、理性的价值等等,他把这种非合理性状态称之为意义丧失(Sinnverlust)。然而遗憾的是,在韦伯看来,这个社会的异化现象是无法根除,也是无可挽救的,他于是对现代文明的前景感到渺茫和悲观。虽然韦伯在合理性研究上立下了奠定基础的不朽功劳,但他衡量和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所用的尺度——工具目的理性不能多角度地分析和归纳这个社会的发生和发展,因此它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1929 -)正是洞悉到了韦伯合理性理论的单向性和片面性,才有了他的重建理性的新思想,在韦伯理论基础上实现并创建了他的交往理性,实现了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的范式转移,从而也更新了经济的价值并赋予经济价值以新的内容。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交往理性

如果说目的—手段合理性行为是独白式的、单线式的,那么交往合理性(Kommunikative Rationalitaet)行为则是对话式的、双向式的。哈贝马斯从语言入手,认为交往行为是一种不同主体间通过符号(语言)协调的以相互理解、同意和一致为目标而不断协调不同主体间的那种行为。交往合理性中的合理根据不是到物的世界去找,而是到人的世界去找,它是交往主体间相互统一、普遍赞同而且自觉遵守的规范。而这些规范正是表现了主体之间对对方行为的期望,由此在这种合理根据上产生的交往就有了合理的基础了。交往行为不像目的行为那样只有目的地,因果地介入客观世界行为,而是主体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协调相处。哈贝马斯很有远见地将研究的视角定位于人,视交往行动为人类行动的最基本类型,将它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它的合理性观点在于:只有主体间的交往是开放的和批判性的,因而是合理的交往,是最高的"上诉法庭"[3]。

经济生活的改变给价值观铸上深深的烙印,无论我们是否及时地意识到,新价值观已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产生影响,无论对它的接受程度如何因人而异,以什么价值为取向所产生的行为将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大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小到一个企业的管理准则直至劳资双方关系。

三、体现交往理性的经济价值观

以上对合理性形式作了分析,显而易见,交往理性应该成为新经济价值观的前提。那么,以交往理性为前提的新经济价值观是怎样在企业目标与经济政策定位上显示其现代意义的呢?

(一)新企业价值观

企业的价值观涉及到企业的基本目标,不同的企业价值观可以导致不同的企业行为和经营模式,因为交往合理性的核心是人,所以它又可以用"新的公众性"来表达。"公众"一词原本属公共关系范畴,公众是指因面临共同的利益问题而与公共关系主体发生关系的社会群体。公众的形式与范围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随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公众对企业的态度及行为对企业的生存具有实际和潜在的影响和制约,甚至会影响企业的兴衰成败,迫使企业面对公众重新组合,这样势必影响企业的体制、组织、改革,又进而影响企业的产品结构等诸方面的变化。另一方面,企业的决策和行为也对它的公众具有实际和潜在的影响作用,这也就是企业为什么要以发展的眼光来认识自己的现有公众、潜在公众和将来公众,围绕自己的公众了。经济一旦发展到一个公众利益和社会要求日益举足轻重的时期,以往那种对经济的纯物质功能的重视将以新的价值观为载体转移到经济与社会利益的平衡上来。交往的合理性是社会一体化和平衡的合理性,在此种合理性概念下的市场关系不仅只奉承商业原则,而且同时将社会诸团体因素的利益和多元价值融入经济决策中,它主张参与,主张一致和理解。

"公众"一词也已昭示给企业不应局限于寻求纯经济问题的答案,如:生产程序、营业额战略和产品发展,而应同时关注经济以外也即企业行动的社会因素。企业应不断深化对公众的认识,满足公众需求,协调与公众的关系,以最终达到大多数公众的满意,得到公众的认同。

在努力寻求企业经营中的新价值观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已作出了表率:1976 年以来,在联邦德国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社会平衡实践"的工作圈,在这个工作圈里的大中型企业都尝试推行与社会有关的企业报表,也即将公众的规范和利益纳入企业决策过程[4]。尽管这一倡议的发展一再受到挫折,但这已表明这种期望的存在和传播。这种期望更明确地说是:经济不再仅被理解为私人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责任,经济就像是一个舞台,经济本身的、生态的、社会的要求都展现在这个舞台上。在美国,自 1970 年以来许多企业实行公布经过数据整理的社会业绩和财产账目,即所谓的社会平衡表(Social balance sheets)。包括有规律的企业职能的社会作用,其中,环境利益被纳入企业决策过程,作为新的价值变迁表述的公众反映和要求成为经济合理性的根本性因素[5]。公众的集体期望压力也直接纳入企业的经营要素里去,这项发自于企业界的"社会指标运动",很大地冲击了美国当时以单纯追求 GNP 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在计量经济发展成本的同时,也将社会发展成本纳入统计。

德国的"社会平衡实践"和美国的"社会指标运动"表明,这种新的经济价值意识以及来自公众利益的压力在西方社会已日益增长,并已深入到企业中去。这种综合成本的理念,正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轻视的。

(二)经济政策中的价值体现

西方先进国家视经济秩序为追求目标,因为在经济秩序下的经济和社会才能更好地、相辅相成地确定自己的责任和价值取向。最理想的是一个拥有高技术、高效益的经济,同时顾及私人和公众的生活世界利益。一方面,经济要继续它的传统取向,即市场关系的专业化和利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要满足社会和个人的要求,将公众对发展经济的思路和意愿作为经济发展决策的主导因素。

以联邦德国为例,这个国家成立于 1949 年,以后一直稳中求进直至成为了一个富裕和福利的国家,它的经济的稳步发展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有一个自由的、社会的经济秩序,这种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模式明显深植于它的社会。即使它在东西德合并后为复苏和扶植前东德的经济,以及为偿付东欧一些国家和以色列等国的战争赔款付出沉重经济代价时,也没有动摇它自战后以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宪法(Wirtschaftsverfassung)① 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没有动摇过它的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 Marktwirtschaft)② 制度,这一制度即是联邦德国的具体有效的经济秩序。它一方面给予私营企业自由的空间;另一方面指配给这个社会构造的国家一个维序的和指挥的角色③。那么,怎样才算是一个维序和指挥的角色?这里笔者想借用欧洲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例子,瑞士、德国、瑞典等社会福利国家在制定即使是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太重要的经济决策时,都要首先吸收公民的意见,公民有权参与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决策,比如德国对周末是否要实行商店开门,晚上商店应几点关门这一新举措作了半年多的全国民意调查,然后采纳有关意见并试行,最后才作出决定。在瑞士,公民还要为此投票表决,从而使每一项经济政策的制定都具有了实际可行性。这种给公民以决定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决策权,正是基于了某种价值取向,即对公众利益的重视。以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作为经济决策的出发点,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四、展　望

经济的价值变迁不但体现在企业目标设置与经济政策的定位上,而且也体现在对社会义务的承担上,诸如对高等教育的支持,研究机构的设立;对少数民族和对环境保护及对艺术、文化、体育等的支持,这些方面都显示出了经济中的多方面社会功能,企业将成为教育的"托管者"。

用社会学的理论对经济的价值进行探索,是崭新的西方经济社会学思想。固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福利的提高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政府的决策和经济发展战略等等,但我们必

① 德国的经济宪法是规范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转的基础性法规,如 1967 年颁布的《促进经济的稳定与增长的法律》等。

② ③参阅德国 1967 年颁布的《促进经济的稳定与增长的法律》第一条(§1 des Stabilitaetsgesetzes)。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须清楚,这些经济政策无论是来自专家或是来自政府,它们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基础上的。如果经济发展战略首先是基于大众的意志并有持续发展的眼光,那么,我们需要一种民本主义的、新的公众的价值观。我国政府最近也重申了要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从概念上讲,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发展观,其实它归根结底是一种新的价值观,是对新经济价值认同的体现。

【参 考 文 献】

[1]G·邓肯·米切尔.新社会学词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57.
[2]Gerd Reinhold.经济社会学[M].德国:奥尔登伯格出版社,1997.190.
[3]尤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的理论(第一卷)[M].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18.
[4][5]Gerd Reinhold.经济社会学[M].德国:奥尔登伯格出版社,1997.200.

[责任编辑 徐 枫]

“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与实践

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其指导思想,为西学东渐创造了条件,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首先,这种思想的提出,有极强的针对性。有清一代,在学术上,嘉庆、道光后,学术思潮趋向于西汉今文学,西汉今古学之争笼罩着这一时期的思想界。在政治思想上,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仍占主导地位。有一大批顽固派仍盲目自大,对西学不屑一顾。面对强大的反对派势力,洋务派首先阐明:中国处于千年未有的变局。并强调:中国的文武制度远远高于西方之上,所不及的只是“火器”。为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靠传统的孔孟之道是不行的,必须借助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其次,这种思想的提出又有其实用性。能使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接受洋务运动,而不使其早日破产;能被一切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所接受,使洋务运动得到更为广泛的支持。

再次,“中体西用”的口号在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在抵御外来侵略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因此,在评价时,在看到它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不应忽视它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内涵。

“中体西用”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为:使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具有合法性;洋务派得以派出大量人员出国留学;创办了一系列的学堂,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被介绍到中国来,产生了华蘅芳、徐寿这样的科学家。因此,洋务运动不仅为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而且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运动准备了物质力量,培养了一大批清王朝的掘墓人。

(王富国)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